



史海钩沉

□韦钦国

《范进中举》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一个故事。《儒林外史》成书于清乾隆十四年(1749年)，书里虽然描写的是明朝的事情，但实际反映的是清朝的状况。

在许多人看来，范进是科举考试悲剧人物的代表：考了20多年都没能考中最低功名的秀才，长期受人排挤、挖苦、嘲笑，没有尊严；中举后又犯病发疯，成为大家的笑料，但事实并非全部如此。范进中举后参加了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进士，从此仕途顺畅，担任山东学道，最后官居三品，在读书人中算得上成功者，从这个角度讲，范进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。

范进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，这个年龄确实大了些，但三年后即57岁那年考中举人，这个年龄中举并非少数，如蒲松龄考十多回直至终老仍未中举者大有人在。“范进中举”中的是举人，参加各省乡试被录取的人才能称举人，举人就具备了做官资格，但中举的前提是首先要考中秀才，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。

清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院试(通过者称秀才)、乡试(通过者称举人)、会试(通过者称进士)和殿试(排出进士三甲名次)，县试与府试则属于预备性考试。秀才虽然是最低功名，但要考取秀才不容易，只有通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级考试才能获得秀才功名。

县试由知县主持，儒学署教官监试，每年农历二月举行。县试作为童生考取秀才的初选条件也不宽松，并非所有读书人都可以报考。从程序上讲，报考人需要填写履历、亲供、互结、具结。履历即报考者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体格、容貌等，亲供是指填写报考者的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三代存歿情况，如属过继则要写本人亲生父母三代。互结是指五名报考者要互结互保，一旦有人作弊，则五人连坐。具结是指由已考取秀才功名的人做担保，保证报考者不冒籍、不匿丧、不替身、不假名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清朝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限制了出身，娼优皂吏、乐艺丐童以及冷籍等人的子孙均不能参加科考。

县试在各县举行，一般考四场或五场，第一场为正场，如果第一场就被录取，被录取者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接下来的几场考试，如第一场未被录取，则失去继续参加下一场考试的资格，只能等到来年再考。

只有在县试中被录取的士子才有资格参加府试，府试多在每年农历四月举行，由知府主持，连考三场。府试程序近似于县试，同样需要填写履历、亲供、互结、具结等，只有通过县试，府试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院试。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，与乡试、府试每年各举行一次不同，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，报名等手续与府试、县试略同，考试地点一般在各省省垣所在地。通过院试的童生称“生员”，即民间所说的“秀才”。

获得“生员”即秀才，就有了相当的好处：享有了一定政治权利，进入乡绅阶层，见了县官不用下跪；可以免除赋税徭役，犯法后不能随便用刑拷问等，但秀才功名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具备了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资格，获得了真正做官的机会。获得秀才资格并非一劳永逸，学政定期对其进行考核，考试合格，都说五一要封城，再屯点采啥的吧才能参加乡试。事实上，秀才即便不参加乡试或乡试未中，只要在学政对其考评中合格，就可以在县衙做吏员(但不能做官)或开馆授徒，个人生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

范进考中秀才与一个叫周进的人有关。周进系山东兗州薛家集人，曾中过“县案首”，但从此在学业上未有进展，60多岁时只好跟随做生意的姐夫金有余来到省城济南做账房先生。在贡院遇到几位好心人，在他们资助下周进一路考取进士，三年后钦点广东学道(学政)，其间在院试中遇到了童生范进。

此时的范进可谓落魄至极，“只见这些考试的童生里，有一个花白胡子的、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、头上戴一顶破毡帽，那人上来交卷时，衣服又被挂破了几块，显得更是衣不蔽体。”当周进询问时，范进诚实地回复，虽然报名册上写的是30岁，但实际上已54岁了。因为院试三年举行两次，范进从20岁考到54岁，如果一次不落地考的话，30多年间确实可以考20多次。

在清朝，秀才平均录取率大约是2.5%，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，对包括范进在内的童生们来讲，考不中秀才是大概率事件，但考到54岁仍没考中倒也是少见。好在院试时周进再三阅读范进的文章，认为是“天地间之至文”，遂录为“院案首”，范进

这才考中秀才。在接下来的乡试中范进一鼓作气，获得第七名亚元，成为举人。但好事多磨，范进中举后其母因过于高兴而撒手归天，范进依例在家丁忧。有意思的是，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本人也仅是个秀才，并没有中举！

清朝举人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呢？清朝存续260余年间，共录取举人约15万人，每年平均不足600人。鉴于乡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，所以每次乡试各省平均录取举人约100人，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，事实上各省相差很大。“乡试中额，依文风之高下，人口之多寡，丁赋之轻重而定。”清政府根据各省人口、赋税、读书人数等给予各省不同的举人名额，没有极特殊情况名额不会轻易增减变化。乾隆元年(1736年)工科给事中曹一士称：“查各直省中额，人才多者额多，人才少者额少，故有大、中、小省之分，此国家因材而笃中正无偏之制也。”山东作为考生大省，乡试举人名额仅为69人，清朝中后期山东参加乡试的秀才约15000人，平均到每年真正的是千里挑一，但中举后举人的身份、地位与秀才又有天壤之别。

从仕途上讲，举人即便没有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(这种情况极少)或没有考取进士也可以做官，吏部和礼部会根据举人个人才能、长相、书法等综合考选，多数可以担任县丞或主簿，优秀者可担任推官、通判等职，类似于现在的副县长、副市长，被尊称“老爷”，进入正式的官僚体系，一届任满如果考评优异还有转正的可能。

从经济上讲，举人就更实惠了，举人比秀才拥有更大的免除税赋徭役的权利，清朝雍正年间规定，举人免除100—200亩的税负和十几户徭役，举人可以把这些免税免役的额度卖给别人，收取额外的钱财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举人一家经济贫困的问题。换言之，举人即便不做官，也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。

在《儒林外史》中，从范进中举但尚未授官的那一天起，范进一家人的经济情况、社会地位等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官商士绅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，送钱送物：“张乡绅前来说喜，送了五十两银子，还有一套三进三间的房子赠予范进一家，之后又有送店面的、送田产的、投靠为仆的，两三个月的时间，范进家里便换了新样，媳妇也打扮得贵气许多。”

几十年的辛苦一朝变为现实，巨大的喜悦突然来袭，不疯才怪呢！唐朝有一位名叫孟郊的诗人在登第后畅写《登科后》一诗，道出了古今读书人登第后的真感想：“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这种心境与范进何异！

人们经常在戏剧或电视剧中看到，有贫穷学子一路乞讨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的情节，这多半是出于剧情需要而设置的，此种情况在秀才到省城参加乡试途中或许会发生，但不太可能出现在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途中。中举后如果举人愿意参加次年在京举行的会试，就能享受朝廷的旅途报销，前往京城的举人是不必为路费担心的。

范进在家为母守孝三年后，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又考中进士，从此这个老男人的人生便开挂了。进士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，有清一朝260余年间共录取进士约27000名。与乡试一样，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，换言之，清政府每次会试全国录取进士平均约100人。进士是在举人中通过会试产生的，清朝每三年约录取举人600名，虽然录取率远高于秀才和举人，但实际算不上高，难度也很大。有许多后人熟知的名人都没能考中进士，如左宗棠考了多次都没考中，最后被慈禧赐予“同进士出身”，属于安慰性质的荣誉。对于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殿试，简单来说就是在进士中排出三甲等名次，殿试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这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奖励和肯定。

县试第一名称“县案首”，府试第一名称“府案首”，院士第一名称“院案首”，如果某名士子在县试、府试、院士考试中均获得案首，称“小三元”。乡试第一名称“解元”，会试第一名称“会元”，殿试第一名称“状元”，如果某名士子在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中都位居第一，称“连中三元”。“连中三元”难度极大，既需要超人的才华，也需要机遇和一定运气，从隋朝兴科举至清末大约1300年间科举考试中，“连中三元”者包括文武在内尚不到20位。

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，优秀者进入翰林院，在中央六部任职，或外放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主官，后人熟知的各朝历史文化名人基本都是进士出身。范进考中进士后担任了御史，后来钦点山东学道。明朝末年始设提学道，清初延袭，清《郎潜纪闻初笔》载：“国初，凡提督学政，惟直隶、江南、浙江曰学院，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、侍读充之，余曰学道。”雍正四年废学道统称学政，每省一人，由皇帝在进士出身的中央官员中选派，一个任期周期为三年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范进中举前一家人穷困潦倒，仅有一间草屋，12月的天气范进仍穿着单衣，在村里经常遭受鄙视甚至毒打，受尽岳父谩骂和凌辱。其妻胡氏因长得丑陋，直到30多岁成了大龄“剩女”才嫁给范进，范进中举给家人带来了惊诧的变化，仅从其妻的变化上就可见一斑。胡氏夫荣妻贵，变成了如是模样：“十月天的时分，穿着天青缎套，官绿的缎裙，督率着家人、媳妇、婢女，洗碗盏杯箸。”想必胡氏30多岁嫁给范进时，都不敢奢想会有这般待遇吧？

【故地往事】

滕县“五三小学”

□孙南邨

1928年5月3日，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之后，地处鲁南的滕县人民立即掀起了声讨日军暴行的活动。为不忘国耻，县城北门里黄家办的小学即更名为“滕县北关五三小学”。

滕县(今滕州)北门里黄家，在当地声望甚高，既是明清时期出过多位进士的名门世家，又是以抗敌御侮著称的英烈门第。民国初年，北门里黄家为滕县“八大家”之一，以开明绅士黄馥棠先生最为著名。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敬仰明末抗清将领滕县黄家瑞先生，曾题联赠予黄氏后人：“神圣家国，鞑奴入侵，蹂躏华土，腥风血雨河山碎，泪尽胡尘父老泣；匡国抗倭，功同史阁，坚守江淮，杀身成仁国魂在，烈名万世永垂馨。”以此赞颂黄家先贤，激励时人、后人。

民国初年，黄馥棠先生一家以教育救国为己任，聘任当地名师及师范毕业的学生为教师，腾出家中20多间房子，在北关办起新式小学。1928年为铭记“五三”惨案，学校更名为“五三小学”；1930年民国政府取缔私立学校，改为滕县第一学区区立第一小学。学校虽几经更名，民间仍以北门里黄家所办学校称之。当年这所学校办得如何？今未见有详实的文字记述，倒是从黄家所办学校走出许多新学、国学皆优的人士，至今在滕州多知其名。诗书画被当今学界赞誉的王学仲先生曾在此就读，他对黄氏父子的教学多有称道。桃李遍滕乡，翘楚天下闻，黄家办学硕果累累，名不虚传。泗上阁藏有当年这所小学自编课文的汇集本《文选》，从课文的选编档次之高，可证其办学理念非同一般。

《文选》为石印活页集装订而成，共184页，是滕县北关五三小学、滕县第一学区区立第一小学时期，课本之外的补充教材。其中，滕县北关五三小学的《国语讲义》部分，有《孟子陈仲子章》《宋玉对楚王问》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《漳南侠士传》《口技》《非攻》《沈云英传》《大铁椎传》《书剑侠事》等古诗文18篇，还有梁启超的《美哉我少年》及法国作家都德的《柏林之围》，共20篇，44页。

《滕州市教育志》记载，五三小学更名为区立第一小学，时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然而，五三小学选编的课文内容却多是宣扬英雄气节的文章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济南“五三”惨案后，这所学校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，因此他们适时精心选编国文补充教材，从小学生开始传授志士仁人的气节意识，为国家培养坚贞不屈的人才。学校讲授国文的教师，由受过良好私塾教育的黄馥棠、黄项才昆仲担任；馥棠先生还是鲁南知名的书法家，兼教书法课。《文选》最后还附有五三小学石印《数学补题》18页，由此可知，这所学校不仅重视国文德育教育，对其他课程也很重视。

由私立改为区立学校后，选编的补充教材内容更是丰富多彩：宣扬英雄人物、抗击入侵的课文有《垓下歌》《木兰诗》《林烈士绝笔书》，有法国作家莫泊桑的《二渔夫》，还有邵元冲的《明耻——为‘九一八’一周年纪念作》；古诗文有《诗经》《战国策》《列子》选篇，有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刘基、戴名世、姚鼐等人的作品；现代作家选有鲁迅《孔乙己》等诗文4篇，另有周作人、蔡元培、冰心等人的作品。据王学仲先生回忆，中学时期，黄支田校长还曾亲手编写过课外讲义《字说》。从现存《文选》的选编到石印成文来看，当年滕县的这所小学师资力量雄厚，办学水平不低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这座县城的新旧文化知识氛围亦不寻常。

养根俟实，时穷见节！“五三”惨案后十年，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滕县城，这里的人民在支援川军抗战时表现出积极踊跃、临战不退的顽强精神，受到川军官兵的一致称赞。抗战前线记者范长江报道《川军在山东前线》：“……黄馥棠(七十岁)辈皆奋身而出，随军队政工人员到乡下宣传……黄馥棠先生七代进士，滕县通家，特作七律古诗以迎川军将帅：‘天上遥瞻节钺临，安危须仗老谋深。晋文攘楚先三舍，忠武服蛮倚九擒。中府一朝诛二竖，阳光普照靖群阴。川军将帅皆韩岳，岂有神州竟陆沉。’”川军参战营长熊顺义回忆：“特别值得纪念的是，滕县城北关当时七十多岁高龄的黄馥棠老先生，我们守备县城驻守北关时住在他家，待我们如同至亲好友，无微不至。为了军民联合抗日，他老人家还经常到农村动员乡亲，积极配合。”

川军来滕抗敌，馥棠先生用书写先人黄治山的诗作以赠，并身体力行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彰显了这位老人自济南“五三”惨案到悲壮的滕县之役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精神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